

马克思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初探

■ 窦康瑞

马克思认为，空间可划分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加深，社会空间逐渐代替自然空间成为空间的主要形态。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空间成为资本控制工人的区域，因而引发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不均、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失衡等正义问题，因此，“正义”成为马克思对空间问题思考的重要切入点。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哲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将马克思对正义的探讨和对空间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将其系统化、理论化，由此形成了空间正义理论。

一、马克思对空间正义的思考

马克思虽未明确谈及空间正义问题，但其在诸多著作中指出了住区隔离、城乡对立、殖民扩张等空间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土地—工厂—城市—殖民地—世界市场”“点、线、面、带”的空间扩张结构，并点明了城市的本质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延长的空间载体。同时马克思强调资本使得空间的作用更加突出，“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和空闲时间的减少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其自由时间，为实现其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

(一)城市内部的空间非正义

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作为一个空间载体，其产生和发展衍生出许多非正义问题，“空间”在这些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其一，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工人的工作日被一再延长，工人逐渐被限制在工厂这一狭小空间中，沦为车间厂房的“活机器”，其工作环境异常恶劣，而资本家往往不用从事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生产空间差别

明显。其二，住在贫民窟的工人和住在豪华社区的资本家在社会认知和尊严上存在显著差异。住区的不同原本只是地理区位上的差别，而如今却演变成身份、地位、财富甚至是道德的象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生活空间上的不同实质上却是阶级水平的差异。

(二)城乡之间的空间矛盾

工业革命之前，城乡彼此相对独立，城市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乡村则以农业劳动为主，彼此都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工业革命后，城乡之间相对割裂的状态被打破。工厂的出现除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也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工业生产与农业劳动区分开来。由于收入的差距和人们对发展前景的渴求，许多农民选择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劳动力的匮乏使得乡村逐渐丧失了发展潜力，沦为了城市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地。工厂规模的急速扩大和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造成了城市的环境污染，工厂污水、工业废气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损害，一时间流行病肆虐。城市的污染也殃及了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本家对原材料肆意索取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三)全球空间上的不平衡

资本主义的诞生伴随着全球性空间问题的爆发。地理大发现后，资产阶级国家开始殖民扩张，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了交通运输水平的升级，人们用花费时间、路程的方式消除原本空间上的阻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形成，而且每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并非平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转移自身国内矛盾，将资本积累的过程转移到殖

民地，殖民地沦为“被吸血”的场所，只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并成为其倾销商品的目的地。在资本主义国家获取大量财富的同时，殖民地的工人只得到了微薄的工资，当地环境也被严重破坏。

二、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农村承担着反哺城市的角色，城乡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但随着开放水平的提高，城乡间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在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一体化道路上的矛盾亟需解决。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

近年来，尽管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农业扶持政策以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收入差距依旧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24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72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4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78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97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为1.82。收入的多少决定了人们消费水平的高低，由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对等

基本公共服务不对等是阻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对乡村的资助力度一直很大，体现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城乡全覆盖，但总的来说，在教育资源、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城乡之间

仍有较大鸿沟。

(三)乡村人力资源短缺

乡村人力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从而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农村只剩下了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导致农村可用人才数量极其有限，严重限制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

三、实现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针对当前我国在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非正义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着力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空间正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流价值。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实现乡村发展的过程中，第一，要处理好好人地关系，既不能只关心粮食产量，也不能忽视农村第三产业用地，坚持适度原则。第二，合理规划乡村，要让“人”这一主体满意，既不违反人类发展观念和自然规律，也不能违反多数人的想法和意志，乡村空间的发展要以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核心。

(二)发展农村生产力

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是造成城乡间空间非正义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塑造农村经济原因，是实现城乡空间正义的重要举措。第一，协调城乡产业布局，将城市工业发展的经验融入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中，

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同时以工业培养人才的经验为基础，推动农民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加大教育投入，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人才储备。第二，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依托农村的风景和环境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康养业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第三，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三)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

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一，逐步取消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使得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同权益。第二，加强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布局，让人们在城市和农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第三，建立工商资本下乡促进机制，推动社会力量进入农村，以资本促发展、以资本提技术、以资本引人才，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

四、结语

马克思以其独特视角，深刻批判了城市内部空间非正义、城乡空间二元对立、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等现象。马克思从空间维度入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普遍存在的空间分级、空间隔阂等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对我国推进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城市面临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空间正义问题的研究，对影响我国城市空间正义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城市、协调城乡空间的二元矛盾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也对我国认识和把握全球空间格局变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长远价值。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空

间正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YCSW2024374)。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 农金洪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来源。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样，各种全球性问题频频发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话语体系的不平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与秩序正面临双重挑战。其一，这一体系未能准确反映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真实发展动态，有悖于当前“大变局”的趋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已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它们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却远远不足，这与它们目前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严重不匹配。全球治理体系仍然由西方主要国家主导，这种滞后性容易造成秩序失衡，从而引发变革呼声。其二，现有的治理体系与秩序在应对全球性风险和人类共同挑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西方中心论”视角已日益显得局限与不合时宜。西方的治理体系尽管在过去曾展现出一定的成效，但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挑战，其局限性愈发凸显。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忽视上，也反映在自身治理效能的下降上，包括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分裂加深、政治极化等内部问题频发。

(二)中国力量日益壮大,展现出发展中大国的使命担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党和国家事业经历了历史性变革，我国不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在经济领域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强劲态势，对全球经济的正面外溢效应日益显著，这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于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随后，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一重要理念被正式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引领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之一，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全球治理中日益发挥的引领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的理论遵循

(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世界历史的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推动力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个人。因此，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扎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全面地理解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趋势，强烈倡导世界各国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呼吁全球各界人士，不论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都应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凝聚智慧与力量。同时，鼓励全球人民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向着更加美好、更加宽广的未来不断迈进。

(二)生产力的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及互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生产力进步作为观察角度，对世界的演变作出了科学的预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变化，从部落、民族到国家，人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形成普遍交往。普遍交往的形成使得各地区及国家交往更加紧密，推动了文化、商品等的交流和传播，从而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此外，生产力和交往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交往方式的变革，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普遍交往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生产

力的进一步提升，这种互动关系使世界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如今，各国之间紧密的联系和频繁的交往、大力发展生产力，再次印证了这一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

(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指向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追求自由解放的过程，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束缚和限制，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们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努力推动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光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世界人民，更是为了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构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一)在共同体意识中走全球共赢之路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导致全球生态恶化、资源争夺等问题产生，不断加剧全球冲突。各国同处于一种局面之中，每个国家都无法从全球性问题中脱离出来，只有相互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解决共同问题的最好选择。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石，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精神内核，摒弃了资本主义中狭隘的利己主义思维，抵制仅少数人获益的不平等发展模式，积极倡导并践行一种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致力于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个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新图景。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开辟了一条平等共赢的全球发展路径。这一路径在对西方传统霸权思维的深刻超越与全面摒弃，它深刻反映了全球民众对于和平、合作与共同繁荣的普遍向往，紧密契合了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是中国站在全人类发展的视角上，为世界提供的一条共赢之路。

(二)在共同体意识中构建可持续性的发展观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当前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观，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然而，近年来，在这种治理体系下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挑战，急需新的治理体系解决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资本主义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治理体系，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理念和视角，以“中国方案”引导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它呼吁各国加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节能减排等关键领域的协作，以形成合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这样的合作机制使各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贡献于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公众健康的维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经济繁荣或社会进步，它坚持走生态之路，这既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全世界人民负责。

(三)在共同体意识中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观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独特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坚持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倡导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主张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发展。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交流与合作中，应当尊重不同文明的特点和贡献，避免以一种文明为中心的偏见和歧视，否则将会落入西方价值观的陷阱当中。同时，要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仅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还能加深文明间的相互理解 and 信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汇聚起强大的思想共鸣。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

■ 王淑琪 董思彤

以西方左翼思想为主要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迅速在国外学界兴起，这一思潮认为资本主义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是退步到一个更为保守和专制的社会形态——技术封建主义。其中少数科技巨头或平台企业像封建领主一样掌握了普通用户的数据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思潮进行辩驳，剖析以“云地租”为主要代表的剥削逻辑，揭露隐藏在背后的是食利者不断扩大其垄断地位，以此构建数字帝国主义的实质。

一、封建主义的回归逻辑：从“土地”到“云地租”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但是土地所有权往往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他们通过将土地出租给农民来获得经济利益，而农民则依赖于这些土地以维持生计。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数字行为都需要依赖于数字平台的作用，这类类似于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小型生产者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而寻求加入大型数字平台，必须定期向平台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若小型生产商未能支付这些费用，他们极有可能被大型数字平台排除在外，面临业务中断甚至破产的严重后果。传统的土地被云空间所取代，农民对地主的依赖转化为生产商对平台的依赖，而地租则演变为云地租。这种关系体现了云贵族对附属资产阶级的绝对控制，类似于封建社会中地主对农民的控制。

西方左翼思想家忽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性和适应性，并未认识云地租只是资本积累的另一方式，其本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转换方式。资本主义总公式是G—W—G'，其中G'与G之间的差数值，即ΔG是资

本增值的秘密，这部分增值的价值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是由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但是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出发，我们发现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并未正确认识这一过程，他们忽略了剩余价值的生成过程，忽略了地租本质上仍然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云贵族们通过控制平台所有权和数据所有权，对平台用户的数字劳动进行剥削，这种剥削逻辑看似与传统封建主义相似，但实际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一种新形式。

二、数字帝国主义的崛起：从“自由竞争”到“数字圈地”

在数字时代，传统的自由竞争模式正在被“数字圈地”模式所取代。数字平台通过构建多个平台的体系和配套的终端体系，占有更多网络领土并攫取数据产权，形成了新的“数字圈地”模式。这种新模式并不能将它简单地理解为“云地租”，而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新型数字帝国主义阶段。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归纳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当下西方左翼学者笔下的科技巨头公司完全符合列宁所描述的这五大特征：一是当前互联网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公司里；二是大型金融公司已经与平台资本进行深度捆绑；三是互联网公司更多的不是通过生产数字产品获利而是通过提供垄断性的平台服务获取利润；四是以平台资本、金融资本与国家所构成的某种新型统治阶级已经形成；五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互联网公司已经瓜分了世界大多数的互联网第二空间。然而，少数平台企业越发脱离生产过程，成为一种纯粹的食利者，这种以掠夺而不是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模式必定会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更多的问

题。大型平台资本

制定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明确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党必须加强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和纠正文化领域内的错误倾向。

二、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重要的论断在历史和现实中得到了论证。回顾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战胜种种困难、完成艰巨任务，根本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的正反经验表明，“两个结合”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坚持和把握“两个结合”。

坚持和把握“两个结合”，要全面贯彻守正创新的精神，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保留住马克思主义的魂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又要在思路、话语、机制、形式这四个方面进行创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多层次的文化需要。

三、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各项工作中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这集中体现在党在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彰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在宣传思想工作

工作中，要求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稳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方式。当代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社会文化创造性的活动中，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创新意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进步。

四、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保障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与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巩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要加强法律法规保障作用，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得出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更是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党在文化领域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确保文化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其二，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文化生产和经营活动，打击文化领域违法违规的行为，营造和谐合法的文化市场秩序。其三，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文化创新活动提供了法律支撑作用，促进文化创新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为保障推进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要不断完善文化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强化执法力度，推进法治文化的宣传教育、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从而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五、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要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为根本，以“两个结合”为基本要求，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最后加强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